

## 第四章

# 茶館生活的衰落

從晚清到民國，茶館都是成都最重要的公共空間，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設施。1949年革命的勝利，不僅重建了中國的政治體制，也造成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根本變化，人民日常生活的改變更是前所未有。<sup>1</sup>本章著眼於1949年到「文化大革命」時期成都公共生活的變化，這種變化表明政府不僅決定著茶館的命運，還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。<sup>2</sup>茶館行業和公共生活緊密相關，因此，本章也討論了政府怎樣加強對小商業的控制，以及怎樣導致茶館業走向衰落。

成都的居民在1950至1960年代仍然能進行茶館生活，不過對黨和政府來說，休閒茶館的存在與建設現代工業城市，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。在那個強調階級鬥爭的年代，茶館也成為政治鬥爭的舞台。由於政府對茶館這種公共空間的密切介入，市民利用這種空間的機會日益縮小。<sup>3</sup>因此，茶館的逐步衰落，與人們被迫退出公共生活是同步進行的。在激進的1960至1970年代，除了政治性的組織、集會，或是其他由政府批准的活動以外，幾乎沒有公共生活的生存空間。所有現存的劇院、電影院及類似的場所都成為政治宣傳的陣地。在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前期，茶館在激進的革命浪潮中，幾乎在一個晚上消失殆盡。人們在公共場所一句不

經意的言辭，可能會帶來滅頂之災。這樣，人們避免在公共生活中或是公眾間談論政治，退回到家中去尋找安全感。但是，家庭中夫妻父子的反目在當時到處可見，所以家庭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風港。「文化大革命」十年是茶館與公共生活在20世紀的最低谷。不過，政府不可能完全地禁止茶館的存在，「文化大革命」後半期它們又頑強地冒出來，繼續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。儘管生存艱難，但它們終於挺到了改革開放的到來。

### 1950年代的茶館生活

老革命馬識途回憶道，新政府成立後，茶館被認為是隱藏著污穢與懶惰的地方，因為黨和政府的領導者們都認為：

既然茶館不再是能支持革命的地方，我們必須堅決地消除它們。因此，茶館倒閉了。儘管人們不喜歡這種不便，但他們除了無條件服從外，無能為力。實際上，一些有識之士認為我們可以取茶館之益而去其之弊，當然，這樣的話茶館的弊處將會完全被消除，茶館將成為一個文化活動中心以及宣傳教育的場所。但當局沒有聽見這些聲音，因此，茶館在四川大地上幾乎消失殆盡。<sup>4</sup>

儘管馬識途所說的「在四川大地上幾乎消失殆盡」有些誇張，但茶館的數量確實是大大減少了。成都作為一個大城市，受到了國家更嚴格的控制，因此也遭遇了更強烈的政治影響，使茶館的消失比農村集鎮的消失更為迅速。根據雷影娜(Regina Abrami)的研究，非成都居民不能獲得營業執照，店主和小販也被要求每年續

簽營業證，而「工商局的幹部們有著極大的權限，去定義什麼是合法私有生意的規模與範圍」。<sup>5</sup>

官辦的地方報紙不再像民國時期那麼關注茶館，有關的報道很少，但有時也從其他角度透露一些信息。如1956年《成都日報》發表〈不怕困難的茶社工人〉，介紹錦春茶社燒甕子工人龍森榮，報道他這年3月被評「行業二等勞動模範」後，在勞動競賽中「又作出了新的貢獻」。他用鋸末代替煤炭燒茶爐子，經多次試驗，終於成功。錦春茶社一天可節約煤120斤，全年達4.3萬多斤。隨後他又向其他茶社推廣這個辦法，幫助13家茶社改進爐灶。<sup>6</sup>回憶資料也從另外的角度揭示了茶館的狀況。如沃若回憶小時候父親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到一家茶館燒開水，家裏的所有財產除身上的衣服外，就只有一床被子、一張油布、一個銅罐。每晚當最後一位顧客離開後，父親便把四張桌子拼在一起，鋪上油布做床，脫下衣服作枕頭，每早天不亮就被幾個喝早茶的老爺子吆喝起來。<sup>7</sup>（圖4-1）

據一位老市民對西御街德盛茶館的回憶，該茶館有兩間鋪面大小，店堂寬敞明亮，分成前後兩部分：前堂多為零星客人，後堂主要為老顧客。該茶館是1950年代初開辦的，生意頗為興隆。德盛茶館每晚都有相聲演出，當時成都頗有名氣的相聲演員都在那裏登台，但由於內容重複，聽眾漸少，後換成竹琴演出。有一位姓楊的竹琴藝人，約四十歲，胖而面善，有彌勒佛之像。他可唱全本《慈雲走國》，聲情並茂，「緊張處讓你提心吊膽，傷悲處讓你潸然淚下」。《慈雲走國》講的是宋朝慈雲太子被奸臣加害，流落民間，後在忠義之士的幫助下，歷盡艱難，掃除奸佞，重振朝綱的故事，很受聽眾歡迎。中間休息時，由妻子挨個收錢，他則閉目養神，或抽煙喝茶。<sup>8</sup>



圖 4-1 茶館熱氣騰騰的爐灶，每一個火眼上放一個開水壺燒水。作者攝於成都郊區雙流縣彭鎮觀音閣老茶館。2021年夏。

又據阿年回憶，1950年代初，他父親經常在晚上帶他到街口的茶鋪裏去聽評書，他在那裏結識了幾個來茶鋪撿煙頭的小伙伴，不久他自己也加入了撿煙頭的行列。碰上評書精彩，聽眾